

《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读后

张良仁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史系)

摘要: 本文试图发掘《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一书所带给我们的新成果和新思路。本书是最早意识到北方地区的学术潜力的著作之一。它所提出的北方模式,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本书运用区系类型方法,首次为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建立了一个系统的年代序列和区系类型。并以此为依托,描绘了一幅高清晰度的动态的中原地区与北方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的画面。本书还特别关注聚落内部与聚落之间的等级分化,还原了聚落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主体的本色。此外,本书的人地关系为我们解释古代的人群迁徙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同时,本书也让我们注意到一些新问题。本文的北方模式引出另一个课题,即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的社会发展、经济形态、自然环境的比较研究,如此或许可以摸索出一些新的决定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自然与社会因素。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仰韶文化可能需要拆分,由此而涉及到界定考古学文化的标准问题。本书有关文化传播的解释有些简单,显示出我们对人类的文化行为方式的认识还很欠缺。人地关系部分资料不足,将来还需要更多的古气候方面的研究。这些都为我们指明了以后努力的方向。总而言之,这是一部站在学术前沿的,吹响时代号角的著作。

关键词: 北方地区; 区系类型; 聚落形态; 人地关系; 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作者韩建业从大学时代起就全身心地钻研我国考古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大量阅读国内外考古学研究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文献,得以开拓视野并打下功底。多年的勤奋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先后有《王湾三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7年第一期)、《殷墟墓地分区研究》(考古,1997年第一期)、《试论豫东南地区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考古学研究》(三)等重磅文章发表。他主笔的发掘报告有三部:《驻马店杨庄》、《岱海考古》第一、三卷。其它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的论文多达二十余篇。其研究时代跨新石器到夏商,其研究地域跨长江到长城。年纪不到四十而有如此成就,他无疑是我国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本书为作者2000年完成的同名博士论文修改后出版的(文物出版社,2003年)。系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2000年重大项目“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阶段性成果之一。全书正文273页,序5页,插图257幅,表8个。

这是一部锐意创新的著作。这不仅因为它开辟了一个新领域,而且因为它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迸发出了许多新思想。而这些新问题和新思想猛烈地冲击了我国考古学上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也是一部厚积薄发的著作。读者不难发现,这些新问题和新思想,正是作者近十年的孜孜不倦的钻研所凝聚的结晶。

本书是最早关注北方地区的著作之一。这片包括陕北、晋中北、冀西北在内的地区,在历史上,除内蒙古中南部以外,考古发掘与研究都比较薄弱,尤其是史前时代。由于地缘的关系,北方有考古专业或考古系的大学大多忽略了这一地区。作者就读的北京大学考古系就偏重于黄河和长江流域。然而本书的意义不仅仅是开拓了一个新领域,扩展了我们的认识范

围：它叩开了一个学术宝藏。北方地区介于中原的农业文化区与北亚的草原文化区之间，对于研究古代文化交流、人群迁徙、游牧业 (nomadism) 的起源具有特别的意义。迪·考斯莫^[1]曾经指出，北方地区（该文所指的还包括新疆、甘肃、内蒙古东部）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相当于商代与两周时期），不仅是畜牧经济为主的草原地区文化与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原地区文化交往的中间地带，而且是许多独立于商周文明的农业经济文化和畜牧经济文化的发源地。而本书进一步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新石器时代（公元前 5000 年至公元前 1900 年）高清晰度的北方地区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画面。更为重要的是，本书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复杂化的模式即“北方模式”（203 页）。中原地区在仰韶三期（距今 5500 年）即已出现阶级分化，到龙山后期（公元前 2200—1900 年）则已迈入早期国家的门槛；与此相反，北方地区从兴隆洼期（公元前 5700 年）到龙山后期一直停留在平等社会的阶段。本书所揭示的这种滞后现象有力地打破了潜移默化于我们头脑中的单一的人类社会稳步前进的中原模式，明确地向我们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多样性。

本书的一部重头戏是为北方地区建立了一个系统的年代序列和区系类型。这项工作的分量不轻。一，本地区的遗址存在的年代都很短，大多不超过本书所划分的一个时期。要建立本书的七个时期（兴隆洼时期，仰韶文化的四期，龙山文化的二期），作者需要收集一大批遗址的材料。然而现有的资料不仅分散，而且发表的质量也良莠不齐。所以资料的爬缕梳理本身就是一项艰巨而棘手的任务。二，本年代序列和区系类型跨越兴隆洼，仰韶，和龙山三个时代，要完成这样的工作非要具备全面而深厚的中原以及内蒙古东部新石器考古的研究功底不可。由韩建业来做这项工作是最合适不过，正所谓机遇只降临有准备的人。他一方面得益于对中原地区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文化都有精深造诣的导师严文明，另一方面得益于他大学毕业以后勤勤恳恳的研究，对这两个时代的文化分期和区系类型已经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这一部分，作者向我们展现了一套颇为独特的研究方法。建立如此大规模的年代序列，全书毫无那种繁琐的型式分析，给读者省去了许多“鸡肋式”的烦恼。他采用的方法是先将整个北方地区划分为内蒙古中南部，晋中北与冀西北、陕北三个小区。每个小区内他选择一系列典型遗址、典型单位、以及典型器物，建立起各小区的年代序列，然后再整合整个北方地区的年代序列。这样既利用了地层，又把握住典型单位中典型器物的整体变化。整个分期做得干脆利落。即使各期的陶器特征描述也很简洁，读起来很流畅。本书还配有翔实、精美的分期图，读者可以自己检验，相当客观。在划分区系类型时，他又抓住典型器物来归纳各期的文化特征，只不过这里他区别开两个层次的陶器组合。第一层次代表某期内整个北方地区的文化，而第二层次则反映各个地方类型的特征。

这里我们发现本书的一个新动向：它描绘了一幅动态的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画面。他所划分的类型多少、分布地域是随时期变化的。如仰韶一期（公元前 4800 年起），作者分出冀西北、岱海、鄂尔多斯—晋中三个小区（类型）；但其后的仰韶二期（公元前 4200—3500 年），他只分了内蒙古—晋中（白泥窑子类型）和晋北—冀西北两个小区（马家小村类型）。各期内各类型的来源各不相同，因为同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类型也在不断变化。这里充分展现了作者的学术功底：他可以对七个时期中两个地理区域各类型的陶器群而游刃有余。如仰韶一期里，冀西北和岱海来源于后岗类型，鄂尔多斯—晋中则可能是半坡与后岗两个类型融合的产物。在仰韶二期，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分化为四类遗存：史家类型（渭河流域和汉水上游）、东庄类型（晋南豫西）、河南中部（没有命名类型）、后岗类型（豫北冀南）。白泥窑子类型和马家小村类型都是受东庄类型影响产生的，虽然也继承了本地仰韶一期的一些因素。在这两期以及后面的仰韶三期（公元前 3500—3000 年）、四期（公元前 3000—2500 年）里，中原地区一直是北方地区文化的输送方。但本书特别指出，进入龙山时代后，北方地区就开始向中原地区传播本地创造的文化因素（鬲、卜骨、细石器镞）。因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北方地区的文化，就像大海一样容纳百川，然后又像波浪一样冲击到晋南乃至整个中原

地区。这种画面实质上是我国考古学观念上的一次飞跃。一方面，它突破了一种僵化的切蛋糕式的或者是分省地图式的区系类型学：一个地区或一个省的文化是本地起源，本地发展，是一脉相承到如今。另一方面，它冲击了根深蒂固的一个中心说——（双横线为破折号，下同）中原地区不再是创造新文化的永不熄灭的发动机，也不再是“野蛮海洋里的文明孤岛”^[2]。

聚落形态是一个前沿课题。本书从房屋形制、内部结构，聚落分布和层次分化四个方面系统地追溯了聚落形态在七个时期内的变化，但它特别关注聚落内部与聚落之间的等级分化，是其独到之处。在兴隆洼期，本书推测这样的聚落“是一个以氏族为基础的”，包括大约“单体房屋、排和整个聚落”三级社会组织的公社（164页）。进入仰韶一期以后，聚落中出现区别于其他房屋的“可能为村落集会、议事”的大型房屋（169页）；这时“有着向心结构的房屋布局，反映出一种利益与共、血缘凝聚、颇有秩序的平等社会状态”（173页）。仰韶三期，这种平等社会仍然延续下来，但是家庭的地位开始凸现出来（199页）。本书发现的“北方模式”（203页）在聚落形态上表现为北方地区在仰韶三期以后，陆续出现“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差别，以及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现象”（仰韶四期，222页），和聚落群（龙山前期，246页）。这实际上也是思想上的一个突破。一种至今仍然盛行的研究方法是把遗址纯粹当作无机的文化载体，视之为房屋、墓葬、器物等成分的组合体。而本书把遗址当作具有生命力的行为个体，还原了它作为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社会组织本色。这对传统观念也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人地关系是本书提出的另一个前沿课题。这里作者吸收了地质学、地理学、气候学的研究成果，以此来检验各期文化的经济形态、房屋结构、人群移动。比起以往只满足于琢磨坛坛罐罐或者附上几个分析报告（孢粉、动物骨骼、金属成分等）的做法来，这种结合自然科学来解释考古学现象的方法是很大的一个进步。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运用这些学科的术语时，一点也不显得生涩。这一部分讲的是，仰韶一、二期为气候暖湿时期，适宜农耕，来自东部的镇江营一期和西部的半坡类型的农民迁徙到北方地区。仰韶三期以后，气温下降，降水减少。这一时期农业虽然继续存在，但是来自东北和东部的狩猎人群进入北方地区；同时节约木材的窑洞式房屋在晋中开始使用。仰韶四期，温度与降水降到一个临界点，与此相应的变化是标志原始战争的石围墙和石墙房屋出现。龙山后期温度下降，北方地区由于人口压力的增长，大量人群开始南迁。过去人们大多将类似的文化变化归因于政治事件（如夏商更替），而本书的自然环境说则为我们解释古代的人群流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

由上所述，本书为我们以后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思路和新观念。同时，它们对我们以后的研究提出了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一，本书一些考古学现象的学术价值，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二，本书的考古学材料表明，我国考古学亟需填补和完善一些理论；三，本书所提出的一些新问题，需要有力的论证手段的支持。而迎接这些挑战将会推动我国考古学的前进。在此本人提出一些粗浅的想法，供读者参考。

如前所说，本书观察到北方地区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上的滞后性，是它的一个新发现。鉴于目前我们对于古代社会发展的认识是以中原地区为背景建立起来的，本人设想：如果对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的社会发展、经济形态、自然环境作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是否可以发现气候、地理等自然条件对政治、经济、社会形态的制约作用，乃至摸索出一些新的决定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自然与社会因素来呢？不论答案如何，这种研究所得到的社会发展规律将会更加客观，其适用范围也会更为广阔。

本书以若干种普遍分布的陶器来归纳各期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方法，再次引发出考古学文化的划分问题。夏鼐的定义已经成为我国考古学界公认的标准。他所提的三个条件：

“一群特征、多处遗址、充分认识”^[3]，在现在看来，很容易满足，仰韶文化也是完全符合的。不过，迄今所命名的文化中，大部分在陶器群上，虽然不完全一致，但相当接近，像大家常提的“商文化”或者“二里头文化”。一些原先认定的大文化如龙山。本书表明，该文化各期的典型遗址的陶器群是千差万别的。如仰韶一期代表冀西北类遗存的四十里坡遗址，“主要器类为红顶钵、锥足鼎、直口球腹双耳壶、圆唇盆、盆形甗、彩陶罐等”，而代表岱海小区类遗存的石虎山I和II遗存，“器类主要有红顶钵、红顶盆、釜、釜形鼎、壶等……此外还有直腹罐、圈足碗、圈足纽式器盖、小勺”（78页）。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共同器物仅限于作者归纳的“钵、壶、盆”（77页）。此外，且不说中原地区，北方地区的地理环境就很复杂多样，包括“中部黄土丘陵梁峁区、东部山地盆地、西部沙地丘陵区、西北河套平原区”（10页）。虽然同属农耕文化区，但生态、经济和聚落形态差异都不小。在这样的共性和特性面前，仰韶文化是否需要予以拆分，实质上是一个界定考古学文化的标准问题。¹夏鼐提出的三个条件没有回答这一问题；它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索。

在谱系研究中，作者采用了我国考古学界常见的套路，即比较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各类型中共同存在的某种陶器、纹饰和其它文化因素，由此追寻两个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在解释文化交流时，这种套路隐含一个假设，即如果类似的东西在两个地方出现，那是因为一个地方的人群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去了。这种方法有的时候是可行的，比方说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第一期遗存在北方地区的出现。因为严文明在序言中说，北方地区仰韶文化以前的“遗存至今只有极个别而难以确定的发现，”也就是说，“那里的居民一定是非常稀少的。”（II页）但是在其它时候就它就有些牵强。按照这个思路，本书提出的龙山前期北方地区的老虎山文化（的居民）大规模南迁，向中原地区带去了鬲、卜骨和细石器镞的假说，就面临两个难题：一，这些南迁的北方人怎么就带去了鬲、卜骨和细石器镞；二，他们怎么带去了中原地区诸文化所呈现的那么多多种鬲形器（按作者的描述，北方地区流行斝式鬲，而客省庄二期文化和齐家文化均为斝式鬲和单把袋足鬲，后岗二期文化则无鬲有甗，127—145页）。看起来，这种假设在解释文化交流上还有盲区；我们还需要寻找更多的解释模式。

文化传播的方式，我国还没有专门的理论研究。实际上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值得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人学过艺术史，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虽然本例属于历史时期，有文献记载的优势，与新石器时代的情形大不相同，但是它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十七、十八世纪的朝鲜画家很推崇我国明清时代的文人山水画，那么他们是如何学习中国画的呢？我国的画家很少到朝鲜去，一般的朝鲜画家也难得有机会到我国来。他们中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随同每年几次的政府使团到北京来，与我国的有艺术修养的官员（晚明的文人画泰斗董其昌作为政府官员曾接待过朝鲜画家，属于例外）和民间画家（集中于琉璃厂）交流。但是他们还是见不到当时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南方画派（杭州、松江、扬州）的艺术家和作品，当然谈不上与他们直接切磋了。不过，使团中的成员（不限于画家）往往通过交换和购买得到一些作品（包括赝品）、画册、画谱，回国后送给或者卖给他们认识的画家和收藏家。这样，朝鲜画家顶多可以接触到中国二、三流的作品，印刷粗糙（较当代技术而言）的画册、画谱，和“微言大义”的理论著作，至于中国画具体的技术细节和思想内涵，大多靠自己揣摩领会了。不过，他们并不只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形成了自己的以郑敦（1676-1759年）为首的山水画派，体现出朝鲜本土的文化氛围和艺术追求^[4]。由此看出，不仅文化传播的方式复杂而且多样，有予也有取，而且接受方并非全盘照搬，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予以吸收转化。在此，我们可能需要有一点“以人为本”的思想，需要考虑人类自身在文化行为中的主观能动性，从而避免把一个人群视为不加选择地接受外来文化的简单的容器。

¹ 类似的标准问题发生在分布于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大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上。该文化在墓葬形制、尸体的摆放姿势、和随葬品相当一致。它命名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但五十年代以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学者依据一些看起来很细微的差别（陶器的花纹、形制，棺槨的材料和建造方法）将它分解开来（Alakul'文化，Fedorov文化，和Nura，Atasu类型）。

在聚落形态部分，本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大家庭的兴起和聚落间原始战争出现的故事。两个视角都很新颖，值得我们借鉴。遗憾的是，目前有关聚落的考古资料参差不齐。仰韶一期的石虎山 I、II 聚落，二期的王墓山坡下、龙山前期的园子沟、老虎山算是全貌清楚的，仰韶三、四期、以及龙山后期就缺乏这样的遗址。即使前面所说的三期也只是一两处，没有多少统计价值。资料的不完备，自然降低了故事的可信度。如果说仰韶四期的寨子圪旦的石围墙（本身宽度作者没说）是原始战争出现的迹象，那么仰韶一期的石虎山 I 的壕（口部残存宽度为 1.3—3 米）作为防御设施也未尝不可。由此本人设想，将来如果有人选择两三个具有不同时期聚落的区域作全面的调查和测绘工作，结合现有的发掘资料，那么他或她就有可能缕出聚落形态变化（居址地貌类型的转换、房屋布局与经济形态的变化、祭祀遗迹的出现，聚落的扩大）的规律来。其实岱海地区，如本书图二一三所示，就是一个很理想的研究区域，因为这里已经发现有 16 处属于不同时期的聚落（223—224 页）。即使就岱海一个地区而言，前景也是相当不错的。

人地关系是本书最富挑战的部分。归根结底，我国对古代气候的研究至今还很薄弱。我们高兴地看到，现在已经有一些气象学家如史培军等开始到考古工地取样。但不容置疑的是，这仅仅是个起步。本书所能收集到的与北方地区相关的五张曲线图（图三、四、五、七、八）大多是整千年（如 1000BP，2000BP）取一个测点，只有表一有两个 500 年的测点（1500BP、3500BP）。这样画出来的曲线图显然过于粗放，难以切合精确到几百年的考古学文化的需要。本书将距今 5500 年（仰韶三期）的干冷期里窑洞式房屋在晋中的出现以及距今 5000 年（仰韶四期）的持续干冷期里人口压力的增加和争夺资源的战争的爆发与气候变化相联系也是它所能期待的最好的结论。这里本人热切希望有更多的气象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研究，那么将来得到的气候波动曲线图就有可能变得精密可靠。那时再来作人地关系这个课题也许能得出更为准确的结论来。²同时，以现有的材料而言，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有可能得出一个粗略的但是相对可信的结论来。本人注意到，虽然图三（鄂尔多斯地区 10000 年冷暖变化过程）的温度没有显示波动现象，但是图四（鄂尔多斯地区 10000 年干湿变化过程），图五（10000 年来黄旗海湖面水位变化曲线）和图六（岱海距今 11000—1000 年湖面变化数据表）反映的距今 5000—2000 之间的降水值起伏很有规律。其中图四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与今天和公元 1000 年差不多。将来如果有人对这两个时期的气候变化以及它们对生态、经济、社会的影响作一番深入研究的话，他或她说不定能建立起一个不错的参照标准来推演新石器时代的情形。那时我们再去衡量气候变化给社会带来的后果就更有根据了。

三

本书在研究和行文方面还有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这些细节在目前的学术著作中并不少见，在此指出来以引起注意，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本书对一些考古学现象的解释带有一些主观臆测的成分。为了抵抗敌人的进攻而建造石围墙，是一种很容易想象得到的说法。但是如果换个角度，说石围墙的建造是为了防御野兽和山洪似乎也可以。野兽自不必说。至于防洪，本书提到的冲沟和水土流失已经显示了这种可能性（187 页）。这再次说明，系统的区域调查与测绘是有必要的。那样做就可以排除一些可能性，从而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来。本书提出单座房屋代表核心家庭，自成一区的房屋代表大家庭（193 页），若干区组成家族公社（232 页）。这作为一种假说当然可以，不过本书没有提供遗址以外的辅助的证据。这里本人指的是民族学以及社会结构方面的研究，但迄今为止，我国仍然缺乏这样的研究。将来如果有人对社会结构和聚落形态做一番系统的梳理，那么他或她就填补我国考古学上的一个

²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俄罗斯的古气候研究，以资参考。相对来说，该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力量较为雄厚，历史较长，而且是多学科相结合，但各学科得到的结论有时会发生冲突。比方说，乌拉尔山以东地区青铜时代的气候，孢粉分析说距今 4300—3500 年之间为干旱期，古地理学说距今 3800—3400 年之间出现湿润气候和针叶林，古土壤学说与当代气候接近，但最后向干旱和大陆性气候转变，考古学和古动物学资料则说是湿润气候，并且冬天较为温暖（见[6]）。

空白。官地房址 F5 内 H61 的 5 具成年男性尸体的身份也是以前难得碰到的现象，所以作者在“英雄”与“罪犯”之间（208 页）拿捏不定一点也不奇怪。面对这样的难题，本人也想不出一个更好的解释来。但是如果从有人已经提出的居室葬^[5]入手，那么本书就有了一个坚实的出发点。本书所揭示的文化面貌相似，地域接近的岱海聚落群是一个有趣的细节。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现成的解释模式，所以本书推测这样的聚落群（如岱海北岸）为友好相处、共同对外的军事联盟，也是可以理解的（241 页）。不过从立论的角度讲，如果作者能够参照历史和自己的社会观察先衡量推测的合理性，那么所作的推测会更加可靠。据本人所知，春秋时期邻国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可是并没有多少邻国的文化存在显著的差别。³

在行文上，本书还不够规范。作为学术论文，不仅文字讲究平实、简洁，讲究准确地表述论证的过程和观点，而且引用书目讲究完备。本书中的口语词汇“公家”（170 页），文学语言“站在山头望，欣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后看，则高峰仰止，气为之折”（238 页），哲学词汇“天人合一”（264 页）都是不宜使用的。书中还有不少似乎无助于论证的描述文字。如介绍仰韶四期内蒙古中南部和陕北遗存时，作者好像忘了他的典型遗址、典型陶器方法，结果陶质、陶色、石器、骨器一股脑全搬到了书上，好像典型遗址能代表同类遗址所有的文化特征似的。书中模糊词汇“影响”随处可见。这个词汇包含的意思有很多；比方说，人群 A 卖或送陶器给人群 B 是影响，人群 A 教人群 B 做陶器是影响，人群 A 做陶器给人群 B 看也是影响。因为本书旨在通过陶器来追寻人类的行为，所以选择更为准确的词汇是有必要的。这不仅仅是用词的问题，而且是研究方法的问题。如果作者考虑到这些具体而复杂的行为方式的话，他也许会考虑“人群迁徙”以外的解释模式。此外，本书关于“典型遗址、典型单位、典型器物”三个概念的叙述，让本人回忆起了苏秉琦、殷玮璋的《地层学与器物类型学》一文（《文物》1982 年 4 期）。可是本章的文献目录中只收入了严文明的《考古资料整理中的标型学研究》（《走向 21 世纪的考古学》，三秦，1997）。两篇文章内容有相似的地方，作为学术论文都应当收入，而且说明有关理论的传承变化，以求公允。

参考文献

- [1] 迪·考斯莫 (Nicola Di Cosmo). The Northern Frontier in Pre-Imperial China.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edited by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885-966.
- [2] 张光直. 商文明 [M]. 张良仁, 岳红彬, 丁晓雷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 [3] 夏鼐. 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 [A]. 夏鼐文集第二编 [C]. 354 - 358.
- [4] 张良仁 (Zhang Liangren). Artistic Activities of Korean Embassies in China. Term paper for an individual study in the field of Korean Ar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Art History Department, Winter 2003.
- [5] 陈星灿. 史前居室葬俗的研究 [J]. 华夏考古, 1989 (2): 93 - 99. 杨虎, 刘国祥. 兴隆洼文化居室葬俗及相关问题探讨 [J]. 考古, 1997 (1): 27 - 36.
- [6] 斯坦诺维奇 (Зданович, Г. Б.). Аркаим-культур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эпохи средней бронзы Южного Зауралья (Arkaim—cultural complex of the middle Bronze Age of South Trans-Ural).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Russian archaeology) 2: 47-62.

³ 此处可能有争议。部分学者认为，进入春秋时期以后周文化分裂，形成各具特色的诸侯国文化（如齐文化、晋文化、楚文化之类）。但是罗泰（见[7]）指出，春秋时期中原地区各诸侯国延续了西周时期的周文化，面貌相当一致。

- [7] 罗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 The Waning of the Bronze Age: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770-481BC.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edited by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50-544.

Review to *Study of Neolithic Cultures of Northern Zone of China*

Zhang Liang-ren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Abstract: This review attempts to appreciate new achievements and new insights of the book *Study of Neolithic Cultures of the Northern Zone of China*. This book is among the first ones that touch upon the rich potentials of the Northern Zone. The Northern Model that it proposes confirms the multilineal variant of social evolution. Applying the “*quxi leixing* (regional diachronic typology)” approach, it for the first time establishes a systematic chronological charter for this area. On this ground, it continues to describe a high-resolution and dynamic pictur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Zone (Zhongyuan) and the Northern Zone. It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t both the intra-settlement and inter-settlement scales, and recovers the role of settlements as active bodies of political, economical,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Furthermore, the discussion of human-environment dynamics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to view ancient population migrations. In the meantime, this book brings up several new issues. The Northern Model opens a new question tha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entral Zone and Northern Zone in social evolution, economical forms, and environments may diagnose new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factors that mold social complexity. The Yangshao culture, a major subject of this book, may need breaking up, which raises the issue of the criteria of defining archaeological culture.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dispersal seems to be simplistic, which reveals that we are far from a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behaviors of human. The chapter of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 lacks a solid database, which calls for much more effort in the study of paleoclimate. All these issues are what we shall direct energy to in the future. Overall, this book is one of those that represent the cutting edge, and herald the future of the field.

Key words: Northern Zone; *quxi leixing* (regional diachronic typology); settlement pattern; human-nature interaction; cultural dispersal

收稿日期: 2005-09-05

作者简介: 张良仁, 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欧亚大陆中部地区及中国北部青铜时代考古。